



八路

N4A

战斗在 山东解放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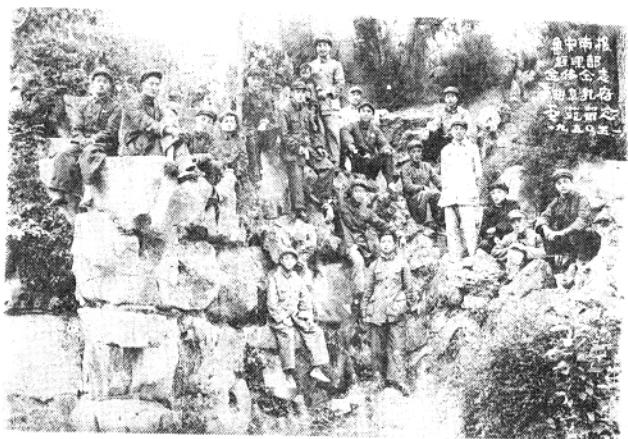
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组
山东省印刷印钞历史研究组（筹）编

山東解放區的軍民，對全國解放作出了重大貢獻。山東解放區的印刷工作者，為山東解放區的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祝四化建設中的山東印刷工作者，發揚優良傳統，爭取更大光榮。

王益 一九八七年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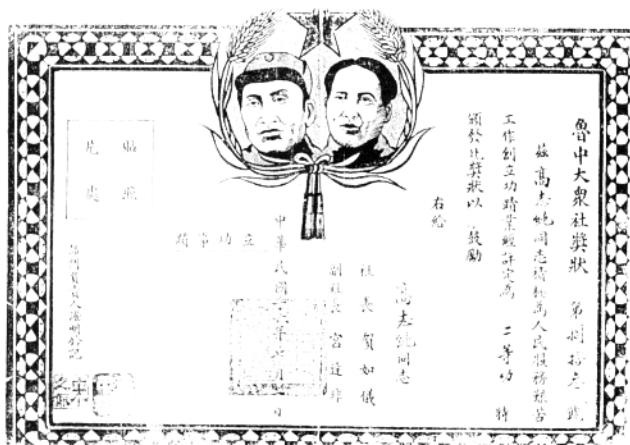
原鲁中大众印刷厂负责人开爱众同志1987年3月来山东召开写回忆录座谈会，与在济南的部分老同志合影



原鲁中南报经理部的全体同志1950年5月1日在曲阜孔府留影



參加印刷1939年1月1日第一期《大眾日報》
的李春松同志（右三）1983年7月在濟南和
部分老同志合影



高志純同志在魯中大眾印刷廠時的立功獎狀

前 言

《战斗在山东解放区》先后已经出了三集，约四十万字左右，这是山东革命印刷印钞史的真实记载。我们组织在战争年代从事印刷印钞工作的老同志撰写回忆录，目的是让人们了解，特别是青年人多了解历史的实际，以便继承和发扬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在建设社会主义四化的大道上，勇于改革，艰苦奋斗，加快步伐，把印刷印钞工作赶上和超过国际水平。努力印刷更多更好的书刊，为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国内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建设两个文明服务；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供有力的武器。

我们编印这些回忆文章，还为了向研究、编写中国印刷史，新闻出版史的同志们提供一些资料。读了这些真实、动人的文章，许多同志认为它再现了八路军、新四军中从事印刷印钞工作的同志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团结战斗，英勇牺牲，艰苦奋斗的情景，谱写了印刷史上光荣的一页。这些文章已经和正在引起研究印刷史料以及做思想政治工作同志们的重视。有的新闻、出版单位在编写史志中就利用其中的有关材料。有些印刷印钞厂也利用其中的有关部分编写厂史或大事记。更重要的是把当年的实际斗争情景通过老同志的努力，用文字保存下来，不致使这些重要史料湮没，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我们要感谢新闻、出版界的老领导匡亚明、陈沂、王益等同志为本书题词撰稿，这对我们的工作是很大的鼓励。在编印这三本书的过程中，承蒙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组、山东省出版总社、山东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山东省印刷技术协会、山东教育出版社、山东省书刊印刷公司、山东新华印刷厂、新华印刷厂潍坊、德州、临沂厂、山东人民印刷厂、济南七二一三工厂、济南槐荫环境保护设备厂、山东省印刷物资公司等单位的有力支持与帮助。没有他们的关怀、支持和帮助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对此，我们谨向这些单位的领导和全体职工同志们致以衷心的感谢。我们还要感谢积极为本书撰稿和提供图片资料的许多老同志，祝他们健康长寿！

由于我们水平较低，经验不足，时间仓促，三本书中难免有错漏，有的内容上还有某些重复，没有精选精编，谨向作者、读者致歉。欢迎同志们提出批评指正。

山东省革命印刷印钞历史研究筹备组

目 录

抗日战争时期的大众日报印刷厂

是怎样坚持斗争的……………郭克刚 (1)

抗日战争时期的大众日报印刷厂 (续)……………李春松 (39)

在那艰苦奋斗的岁月里……………秦 诚 (56)

——忆在大众日报社印刷四厂的工作片断

革命的一生……………薛兆涌 (65)

——缅怀董文精同志

二厂女工学文化……………王作颖 (71)

斗争生活片断……………李光祥 (77)

文艺宣传活动小忆……………郑世芸 (81)

赶印大反攻的宣传画……………陈作仁 (84)

回忆南下历程……………张瑞同 (91)

忆华中银行总管理处主任胡金魁

同志二、三事……………周 询 (97)

校对工作三年……………王颖奋 (99)

抗日战争时期的大众日报印刷厂 是怎样坚持斗争的

郭克刚

一、印刷厂在沂水县云头峪

1938年冬，我在山东分局的岸堤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校长由分局宣传部长孙陶林同志兼任。学校当时分两个队，即军事队和政治队，后来又增加了民运工作队。我在政治队学习。队长是宋德甫同志，预计每期三个月。1938年12月初，我学习尚未结束，鲁南总工会向干校要干部，就派我和孙伯清到鲁南总工会。这时鲁南总工会驻沂水县的南庄，距分局驻地王庄约二、三里路。总工会的主任是张铁民同志。到鲁南总工会后只待了六七天，就分配我到大众日报印刷厂作指导员工作。

印刷厂开始叫印刷所，厂长是一川同志，他是老党员，抗日战争开始前，他在山东泰安市教育界作地下工作。抗日战争开始后，山东地下党在徂徕山组织起义（四支队）后，于一川同志从泰安县城和济南市内，联络部分进步的印刷工人，搞了一部小脚踏子印刷机及部分印刷设备，建立了印刷所。

我到印刷厂时，工厂驻在沂水县王庄北面的云头峪。云头峪是一条东西向的山谷，有三个自然村，即下庄、二庄、

顶庄。下庄比较大，约有二十来户人家，二庄和顶庄较小，各有十来户人家。印刷厂主要驻下庄，少数工人住二庄，只有石印机放在顶庄。

印刷厂的组织是厂长，下设三个股：工务股，股长田桂芳，下分机器组（组长李春松），排字组（组长张钊），装订组（组长隋明甫）。校对股，股长徐华；庶务股，股长黄仲华。全厂设一个党支部，有七、八个党员，支部书记由于一川同志兼。干部工人合计也只有三、四十人，有一台手摇四开印刷机，两部小脚蹬子，一部老五号铅字，其他大号字不全。另有一部石印机。机器陈旧且不说，印刷材料也十分缺乏。印刷厂共占用四间小房，两间小北房一间排字，一间放印刷机；一间东房放两台小脚蹬子，一间西房做装订及存放纸张。总面积也不过四、五十平方米，设备简陋、材料缺乏，条件相当困难。

抗日战争开始一年多了，山东早已成为沦陷区，但因日寇兵力不足，仅能占领县城而已，广大农村是无法控制的。由于敌人的烧杀掠夺，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仇恨，这对我们开展敌后工作是极其有利的条件。不过由于国民党长期反动宣传的影响，开始，山区人民对我党我军尚不了解，有恐惧与疑虑。印刷厂刚一移到云头峪，村中年轻的妇女几乎都避到外庄亲戚家去了，所以印刷厂的干部、工人，除了完成印刷任务外，还要随时随地作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动员群众起来抗战。经过一段时期的宣传以后，躲到外村的年轻妇女才陆续回村。在云头峪这一段时间，于一川同志接触的人多，工作做得比较深透，他在这三个村的威望比较高，过春节时，很多群众请他到家中过节。在宣传党的方针

政策、教育群众的同时，我们还协助地方做发展党员的工作，在印刷厂离开云头峪时，已建立了地方党基层组织，并有六、七个中、青年人参加了印刷厂的工作，当了印刷工人。

二、山东《大众日报》创刊

1939年1月1日，山东《大众日报》创刊，《大众日报》是中共山东分局的机关报。

1939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正面进攻尚未停止，仍处在敌进我退阶段。山东已沦为敌后，但广大人民不愿作亡国奴，抗日情绪很高，在我党的组织与领导下，纷纷起来参加斗争。敌后的游击战争普遍发展起来，直接威胁着敌占区。敌人为了巩固占领区，一方面加紧了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同时从正面战场上抽调一定的兵力扫荡我抗日根据地。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达到逐步向日寇投降的目的，也在到处制造磨擦事件，屠杀我党政军干部战士及根据地的群众，妄图制造分裂，破坏已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这是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大众日报》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诞生的，它担负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组织群众，坚持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粉碎敌人扫荡，建设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等艰巨任务。同时，还要不断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准备投降的阴谋。

当时，大众日报社随山东分局驻在王庄，第一任社长是刘道生，总编辑是匡亚明。在1939年2、3月间刘道生调动工作后，社长由匡亚明担任，兼任总编辑。1939年创刊时为三日刊，后改为日刊。每期在王庄编好后连同画好的版面，由

交通员送到云头峪印刷厂排印。

印刷厂的条件很困难，只有一部老五号字，因无铸字机，每个字要反复使用，有些字已磨平，印出后很不清楚，常用字也经常不足。一部铅字每种字的多少，是根据旧社会使用的概念和术语安排的，对我们印书印报所使用的术语概念很不适应，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产生的许多新术语，如“根据地”、“反扫荡”、“游击战”等等，旧社会根本没有，我们却要经常使用，因而排版时经常缺字，没有铸字机，就靠翻字盒翻字。翻字是一种很费力的工作，要先用小铁勺在火炉上将铅熔化，再将熔化了了的铅水徐徐倒入安置了字模的盒中，微冷后将铅字取出来，将字的尾部磨平才可使用。一个小时翻不了几十个字，有时还需两三个人配合作此工作。

大号字，即作为各类标题用的1—4号字也很不全，经常须用铅空来刻。如报纸创刊后的第二期（或第三期），有一篇社论，“社论”二字需用特号字，但却没有，工务股长田桂芳找我问道：没有特号字，字号又不能改，叫我写后用木块刻，我说写不好怕不行，他对我说：你写吧，我看你写的字还可以，后来我写了，报纸印出后送到报社，匡亚明同志看了后说“社论”标题的两个字不好，很不满意。

铅字缺，排版用的其他材料也缺，如铅条、花边、铅空等，当时就千方百计用其他材料取代，如请木工刨小木板代替铅条，用小方木块代铅空等。

印刷厂只有一部手摇四开机，每次只能印两版，整张报纸要反复印两次。开印时，每班要四个人，一个负责续纸，这是印刷机的主角，两人轮换摇轮，一个照看油墨并整理印

出的报纸，每小时约可印几百份（单面）。冬天最艰苦，房内无取暖设备，有时排字工人冻得手拿不住字盒，只能靠口中的气呵呵手，然后再继续工作。《大众日报》当时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印刷出版的。

报纸印好后，由交通员从印刷厂用扁担挑到报社的发行部门，再按各地的需要数目，分好打包捆扎，再由交通员分送各地交通站、分销处，然后分到各机关及读者手中。从发行部门到读者这个过程也很复杂并需经过许多波折，除了路途上的翻山越河的困难外，常需通过游击区或敌占区，许多交通员就因此而壮烈牺牲了。

1939年2月份前后，从济南买出了一部新五号铅字，还有一些四号字和部分印刷材料纸张等。换用新字后，《大众日报》比过去清楚多了，从报社领导到每个同志，大家都很高兴。不久又从其他地方买来一台石印机及其他材料，印刷人员也在不断增加，印刷厂在不断扩大，出现了一派发达兴旺的景象。

根据形势的发展，厂长于一川同志向干部提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敌人会对根据地反复扫荡，环境会更加艰苦，现在应该考虑我们如何为应付更残酷的斗争创造条件，坚持印刷工作。为了使《大众日报》能在任何环境下出版，要在思想上、技术上、物质上充分作好准备，要求干部每人学会一种或几种印刷技术，以便在任何情况下，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能坚持印刷工作。这样，搞校对、作事务工作的同志，都学习起印刷技术来。我首先学习了排字，开始学送字，后学拣字、排版，也学了装订和在机器上续纸。这些当时我都能操作了。如拣字，一个排字工人每小时能拣一千

一、二百字，我每小时也能拣八、九百字。装订技术中的折页、配页这些工作我都能作。这样，不仅学习了技术，也更深入、更广泛地了解了工人，和他们从思想感情上建立了联系。对于印刷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也易于解决，后来改造排字架，就是以这些工作为基础的。

1939年2、3月份，印刷厂内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印刷厂工务股长田桂芳，企图拉一部分印刷工人到国民党山东省府印刷厂去的事件。事情经过是：当时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驻在沂水县的东里店，离云头峪仅几十里路，由于进行了统一战线工作，和他们的关系还不是很坏的，我们的代表赵笃生同志常驻他们省政府作统战工作。据说国民党省府为了发行钞票想建立印刷厂，有人和我们厂的田桂芳熟悉，就偷偷来云头峪找田，以欺骗利诱等手段想让田从印刷厂拉一部分人过去，以搞垮我们的印刷厂。他们偷偷地来往过两次后，就被印刷工人侯子春同志发现了，他向厂领导作了汇报，我们就注意了这件事。田开始可能有顾虑还在秘密进行，后来胆子大了，竟半公开化了，他在工人中公开散布，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也抗日，两边工作都是一样的，我搞印刷的两面都得照顾到。这样就对群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开始厂领导对处理此事还有些犹豫，后来见问题逐渐严重，就下了决心，向上级领导作了汇报后，立即将田扣了起来（大扫荡开始后将他放了，据说他回了济南后被日本人搞死了）。在厂内作了宣布，这样就打击了这种想到国民党省府印刷厂去的气焰，振奋了革命精神，稳定了工人的情绪，提高了全厂印刷工人的思想觉悟水平。

1939年3、4月份，上级派一位唐同志来印刷厂作副指导。

员。根据工作的需要，建立了印刷分厂，由我任分厂长，驻云头峪的顶庄，设备包括一部老五号铅字，一部八页印刷机，加上两部石印机，共有三十余人，主要任务是印宣传品和小学课本。不久又派吉伟青同志来印刷厂作副指导员。

三、第一次反扫荡斗争

1939年5月，日寇集中了五万兵力，对沂蒙山区进行第一次大扫荡，配有飞机、大炮、坦克，从沂蒙山区周围各据点出发，分路合击我沂蒙山区，妄图一举摧毁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时，我们和国民党的统战关系也在恶化，他们不断制造磨擦。1939年2月，他们制造了有名的太和惨案，屠杀我渤海区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率领到沂蒙区山东分局岸堤干校学习的七、八十名干部。国民党的秦启荣、刘桂堂（外号刘黑七，国民党收编的土匪队伍）和新四师到处袭击我机关和驻军。因此，还要随时准备击退国民党对我们的袭击。

根据山东分局的指示，在日寇开始扫荡前，我们已作了准备。印刷厂将铅字装箱，选择合适地点埋藏起来，其他物资器材也分散隐蔽了，职工编队离开了云头峪，到王庄东南面一个小村子里临时住下，报社机关人员不久也来到这里，由社长匡亚明作了反扫荡动员。根据山东分局指示，大众日报社、鲁南总工会和其他三、四个单位共同组成“沂蒙工作团”，下分几个队，有民运队、武装队等等。团长是匡亚明同志，还有几个副团长。我被编入武装队，武装队大多都是工厂的工人，任务是一面打游击，一面作群众工作。在反扫荡期间发动群众，建设地方武装，巩固地方政权，争取粉碎

敌人扫荡。同时对老弱同志作了必要的疏散工作，让他们隐蔽在群众之中，和群众一起活动。

这是敌人第一次大规模扫荡，当时大家都没有经验，在部分工人中，特别是由城市参加工作的同志中，有人存在一些恐惧思想，又加上印刷厂在处理了田桂芳事件后，也有一些人由于和田是老乡和亲属关系等原因对我们存在一些隔阂，我们的思想工作也有些跟不上，所以个别人员提出要回济南。

印刷厂的老工人来源主要来自两个地区，即泰安县和济南市，田桂芳来自济南，他在来自济南这部分人中影响较大，因为除地区关系外有些人与他也有亲戚关系，在处理了他的问题后对这些人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我们对此作了说服工作后，还是争取了一些人，但也走了七、八个人。走的人数虽少，但技术是很强的。如隋继昌、苏子芬是排字技术最好的，隋明甫是装订工作的老技术工人，这对印刷厂的确是个损失。现在看来，可能当时对形势的估计过分严重，对这些人思想工作作得也不充分造成的，尽管这些人离队了，但印刷厂的基本骨干力量是保留下来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敌人扫荡开始后，队伍住的地点就不固定了，一般一个村只住两三天，有时一天换个地方，名副其实地过游击生活。有一天，我们到达了一个村子，当地群众报告说，国民党五十一军有五、六个散兵，在村外山沟中隐藏着，向老百姓要东西，当时我们由于寄愚同志带领着，他指挥两个班分两路将山沟包围起来，然后叫我到山沟里去和他们谈要他们出来。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思想有点紧张，于寄愚同志

看了出来，就说：“好吧！咱们一起去”。他叫我，还有工厂的校对孔庆龙同志，三个人一起进了山沟，这时，我们的两个班早已爬上了东西两面的山头，有一个国民党兵看到事情不好，向我们队伍打了几枪，向南爬山逃跑了，其他几个人没有动。待我们进谷后，见了他们，向他们说明了我们的身份，要他们不再欺负老百姓，并告知他们，愿参加我们的队伍可以，愿回家我们可发给必要的路费，但枪支不能带走。后来他们表示都愿回家，我们分别发给他们几元大洋，他们将枪支交给我们后回家去了。

团部根据民运工作同志的报告，了解到国民党五十一军的一部分溃兵将一部分枪支子弹掩藏在王庄西北二十几里路的龙湾村。匡亚明同志带着我们一个班去起枪，到龙湾村后，找到了村长，向他说明了来意，并宣讲了我们的政策，他开始害怕，不承认有此事，后经过再次说服，他思想半通半不通的将枪交了出来，估计有长枪一百多支，但子弹很少，由村中找了几头驴子将枪驮了回来，大家都很高兴。

尽管条件艰苦，但同志们都是很乐观的。有一次团部驻在云头峪，岸堤军政干校的一个学员叫高贵堂（后名高克辛）因执行任务，夜间行军与队部失掉联系，找不到部队，找到我们沂蒙工作团，经匡亚明同志同意，将他收留下，编到特务班作侦察工作。到扫荡结束当了排字工人，大家经常开玩笑说：扫荡中不但没受损失，反而拣了一个老高同志。

龙湾起枪回来后，团部驻扎在沂蒙公路以南，郑家园北面的一个南北向的小山沟中，叫甘泉寺的一个破庙里，团部就设在庙里。一天晚上得到情报说，附近敌人的据点增兵，但团部未转移。第二天清晨的情报，敌人已出动扫荡，团部

想向南去郑家团，派出侦察组侦察，回来报告说，敌人已占了郑家团，并顺山峪北来，这时匡亚明同志才下令撤退。我们出甘泉寺向北山爬去，还未爬到山顶，敌人已到山脚下，但大家并不畏惧，有的同志开玩笑说：敌人来和我们换防了。我们到了山顶，匡亚明同志让我带领一个班，阻击敌人，掩护团部撤退。这个班有八、九个人，记得其中有了瑞光（当时的校对，现在济南军区政治部），白明（装订工人）等。我们这一班人散开，找好掩体，敌人已分两路顺着山沟向山顶爬来，太阳旗已看得很清楚了，我即下令开枪射击。未打响以前，思想还有些紧张，打响以后，一心想的是怎样打退敌人，什么紧张念头全消失了。

进攻我们的敌人看来足有一百多人，距我们约三、四百米，一面打枪，一面向山上冲，机枪、步枪响成一片，我们开始还掩蔽着趴着打，后来干脆居高临下站起来打了。打了一段时间敌人冲上来了，估计团部也已撤走，我即下令撤退。我们顺着山岭向北撤去，由于缺乏战斗经验，撤到后来，大多数人都失散了，好在战斗前已有安排，预定了失散后的集合地点，不久我们又都一个个的回到了团部驻地。

这次作战，我们无一伤亡，但战果也不清楚，由于是第一次作战，还没有战斗经验。

又有一次，沂蒙工作团到了马头崖（在云头峪东山前）。当地群众报告，国民党五十七军的几个士兵藏在附近一个村中，还带有一挺机枪。于寄恩同志就带我和刘进功同志一起到了那里。群众带我们到了那户人家门口，刘进功站岗，于和我一起进了房子，果然见三个国民党兵正在吃东西，他们也是国民党的溃兵。我们说明身份，讲明我党的抗